

doi: 10. 3969/j. issn. 1672-0598. 2009. 03. 24

“石化花园”里的夏娃 ——多丽斯·莱辛笔下南非高原上的女主人公*

蒋花

(四川外语学院 出国培训部,重庆 400031)

[摘要] 莱辛的非洲作品描绘了生活在南非高原农场上的三种类型的女殖民者。玛丽·特纳和卡鲁瑟尔太太代表了生活在偏远农场里贫穷、孤独和无望的家庭主妇;格尔太太和巴恩斯太太表面生活正常,内心却扭曲异化;格兰奇太太、莱思太太和玛丽·泰勒则是被边缘化的他者。

[关键词] 南非高原;贫穷女人;内心扭曲的女人;他者中的他者

[中图分类号] D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9)03-0117-05

南非高原上的女性殖民者构成了莱辛笔下——道独特的风景线。作为“白色神话”(white mythology)的根基,她们有着太多的禁忌,由于害怕所谓的“黑祸”(black peril),她们沦为了非洲丛林和南非高原的囚徒。她们是被流放到“石化花园”里的夏娃。她们的流放生涯,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话说,是一种永远无法感到满足、宁静或安全的生活。^{[1] (p186)} 父权制社会和殖民主义相互勾结,形成了一股股压抑人性的社会力量,它们如无形的绳索紧紧地卡住女人的脖子。换句话说,既是大我(the self)又是他者(the other)的集体身份严重扭曲了她们的主体性,压抑了自我(the self)的发展。她们内心异化,生活在精神崩溃的边缘。莱辛的非洲作品描绘了生活在南非高原农场上的三种类型的女性殖民者。《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特纳和《第二间棚屋》中的卡鲁瑟尔太太代表了生活在偏远农场里贫穷、孤独和无望的家庭主妇;《德·韦兹夫妇来到克鲁夫庄园》中的格尔太太和《爱尔多拉多》中的巴恩斯太太表面生活正常,内心扭曲异化;格兰奇太太、莱思太太和玛丽·泰勒则是被边缘化的他者。

一、偏远农场里贫穷、孤独和无助的家庭主妇

偏远农场里贫穷、孤独和无助的家庭主妇是莱

辛非洲小说中最悲惨的他者。由于极度贫困,她们只能住在破败的房屋内,忍受烈日的暴晒、漏雨的凄苦、毒蛇和蚊虫的叮咬。她们没钱修缮破屋,没钱送孩子上好学校,没钱买新衣服,更别提度假了。在这样的房屋下生活,小说《玛莎·奎斯特》中的奎斯特太太整天担心屋顶会垮下来砸在他们的头顶上,玛丽·特纳整日待在铁皮屋顶的房屋下,夏天滚滚的热浪逼得她无精打采几乎精神崩溃。除了贫穷和恶劣的居住条件,孤独如鬼魅般无情地啃噬着她们的身心。作为女性,她们只能呆在房屋内操持家务、抚养孩子、管理黑人家佣。她们不能整天守着孩子,因为孩子经常跑到外面去玩,且当孩子长大后离开家;她们不能和黑人家佣有特殊的关系,因为这犯了“白色神话”的禁忌;邻居们通常居住在几英里或几十英里之外,交流很困难。因此,即使是女人们互相憎恨,她们也会珍惜来之不易的相聚机会和脆弱的友谊;她们也不能指望男人慰藉她们孤独的心灵。正如短篇小说《爱尔多拉多》中的巴恩斯太太意识到她无法击败的对手是非洲大地——“这块粗鲁野蛮、生机勃勃、变化无常的‘女性他者’。她会害怕它,因为她生活中的男人将会掠夺它、热爱它、强奸它或被它勾引,从而离开她。^{[2] (p44)} 居住在农场上的白人男子几乎都被非洲大地所吸引,他们整天都泡在田地里,守着

* [收稿日期] 2009-03-14

[作者简介] 蒋花(1971-),四川名山,副教授,博士,在四川外语学院出国培训部任教,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他们心爱的土地。

对这些家庭主妇来说,农场是围墙和敌人。被禁锢在陌生而且贫穷的农场上,她们无望无助或兴味索然或精神崩溃。正如科特(Wesley A. Kort)所指出的当环境具有对抗者的特征时,小说中的人物们发现他们面临的敌人不是其他人,而是无所不在的、不确定的和恶毒的空间环境,而且他们不知道如何和这空间环境作斗争。小说人物发现他不是和另一个人抗争,因为如果是这样,即使失败了,人物也会由于抵抗而获得一定的道德水平,而不确定的不利环境则让人物陷入迷惘和无助的境遇,他们对环境本能或绝望的反应反过来又会恶化他们的生存空间。^{[31] (p17)}

如果说不利环境让人物陷入迷惘和无助的境遇,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则联手打造出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即作为白人女性,她们涉足非洲丛林,整日只能呆在房屋内,忍受非洲丛林的包围和一无无际的南非高原的精神折磨。一无无际的南非高原对女人来说是无边无际的孤独和与世隔绝。对此,谢莉·布多斯(Shirley Budhos)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莱辛的很多短篇小说以及早期作品中都描述了那些结婚后搬到南非高原居住的女人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女人们丧失了学习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无法成为情感和谐平衡和能发挥作用的人。”^{[41] (p30)}《玛莎·奎斯特》中的奎斯特太太居住在破败不堪的房屋内,躺在床上向外望去,看到的是房屋的前部向南非高原延伸开去,“就像一艘船的船头”,^{[51] (p14)}感到厌倦不已,一直嚷着要离开这地方,搬到城里去住。玛莎·奎斯特,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女孩,尽管喜欢南非高原的宽广,却对它的平坦和贫瘠感到绝望。《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特纳无力摆脱这种生活,最终凋零在南非高原这座“石化花园”里。

作为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社会的直接受害者,玛丽从未了解自身,不敢直面个人的情感需要。她既没有勇气违背作为“大我”的社会价值观,也没有勇气面对作为女人的需要。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她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人生,这正是她悲剧人生的根源。16岁时,玛丽从学校毕业,在镇上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摆脱了终日为贫困而唠叨的母亲和酗酒成性的父亲,玛丽生活得很快乐。无忧无虑的新生活不仅使她忘记了苦难的童年生活,而且让她忽略了种族主义和阶级划分,逐渐地她对人和事形成了一种不带个人情感的态度。她发现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生活可以让她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时间很快

过去了,转眼她已经30岁了,但是“她的头发依然梳成少女式,披在肩上,又穿着淡色的少女式上衣,态度还是那样羞怯天真。”^{[61] (p33)}无意识中,她拒绝接受自己已过了少女时代的事实。事实上玛丽这样做是避免长大和承担作为女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她母亲的生活在她心理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她不愿意重复母亲贫穷、无望的痛苦生活。因此,她保留少女的衣着打扮,成天忙于工作、运动和娱乐活动,她让自己太忙而没有时间思考和考虑自己的需要,逐渐地她遗忘了个人情感和自我的需求。然而,作为一个女人,她无法逃脱作为“他者”的命运。一天,她不小心偷听到她的朋友们在谈论她,她被她们谈话的内容震惊了,她开始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生活。意识到自己无法逃避的性别角色让她痛苦,一时之间她心理失衡了,从此失去了快乐。她开始改变发型和衣着打扮,甚至开始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并和一个55岁的鳏夫交往,因为她以为该老头是想找一个说话的伴而不是找个性伙伴。所以,当老头企图和她做爱时,她觉得恶心并仓皇逃走。这件事在镇上广为流传,一时之间玛丽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谈论的笑料。朋友们觉得玛丽的行为简直不可原谅。这件事对玛丽的打击很大,她几乎崩溃。当贫穷、孤独的农场主迪克向她求婚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随迪克搬到了农场去住,从此开始了她噩梦般的生活。

迪克的农场离镇上有一百多英里。他们居住的房屋低矮,屋顶是铁皮,屋内散发着动物死尸般的霉臭味,偶尔会看到地上和墙壁上有一些小动物,屋内没有几件家具,有些家具还是邻居给的。屋外是密密匝匝的非洲灌木丛和无边无际的南非高原。迪克非常坦白地告诉玛丽他日子过得很艰难,迪克的话和眼前所见的不仅让初次来到此地的玛丽异常失望,而且让她想起死去的母亲所过的痛苦生活。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在重复母亲所过的一生,注定逃不掉这样的生活。尽管农场生活让她很不满意,玛丽还是努力让自己适应这一切,将自己塑造成父权制社会所需要的角色。用自己工作攒下的钱,她买了一些印花布匹、亚麻布、陶瓷餐具和其他一些东西,让昏暗的房屋有了几分亮色。她不停地缝制衣服,甚至亲自粉刷墙壁,这些事情让她暂时忘记了农场生活的枯燥。钱用完了,手边没事可做了,玛丽甚至开始看书,可看书实在提不起她的兴趣,于是她开始走进厨房并开始管理黑人家佣,也因此第一次遭遇到了种族主义问题。她关于种族的记忆从此开始复苏。她开始将自己对婚

姻生活的不满发泄到黑人家佣身上,导致没有黑人愿意为她干活。此外,由于惧怕所谓的“黑祸”和非洲丛林,她几乎足不出户。她对“黑祸”怀有莫名的恐惧,因为“凡是在南非洲长大的女人,从小就给教养成这种样子。在她小时候,大人不允许她单独一个人出去散步,她如果要问明根由,人家就偷偷地、低低地、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声音告诉她(她一想到这种声音,就联想到她的母亲),土人是怎样地下流,会对她做出恶劣的事情来。”^{[6] (p52-53)} 贫穷、孤独、绝望逐渐让玛丽和迪克经常吵架,且语气竟然和母亲当年为钱的事和父亲吵架一模一样,“这并不是玛丽个人的声调(她实在不在乎浴缸或是土人去留的问题),而是一个受苦的女性的声调,她要求丈夫不要那样对待她。一会儿工夫,她要哭起来了,就像她母亲遇到这种场合时那样哭法:带着一种庄严的、被牺牲者的愤怒。”^{[6] (p74)} 为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迪克养蜜蜂、养猪、养火鸡、养兔和鸡,他甚至开了一家专门对土著民营业的杂货店,并要求玛丽当营业员,这让玛丽特别难受,因为这让玛丽想起她童年的痛苦。迪克的种种努力非没有任何成效,反倒让他们陷入更大的债务中。玛丽终于意识到随便哪个女人嫁给了像迪克这样的男人,迟早总会懂得自己可以办到两件事情:或者是白白地气愤,白白地反抗,结果把自己弄得发了疯,使自己粉身碎骨;或者是严格控制自己,含辛茹苦。^{[6] (p85)}

极度失望之余,玛丽决定跑回城里。老东家在报上登载的招聘速记打字员的广告让她兴奋不已,她以为她还可以过上以往快乐的城市生活。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让她的幻想彻底破灭,作为已婚妇女,她以前居住的女子俱乐部公寓拒绝接纳她,她工作多年的老东家也拒绝雇佣她。社会对已婚妇女的偏见彻底让她变得麻木不仁,只是一种疲倦的斯多葛主义支撑着她继续和迪克生活下去,但内心开始分裂。她无奈地接受了南非高原上贫穷、孤独农妇的悲惨命运。玛丽的悲惨生活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根源是造成人“不安全本源”的原因之说。^{[7] (p67)} 玛丽是如此的麻木不仁,以至于她对于毒辣的太阳和地面的石块都没感觉了。当她发现黑人家佣摩西斯还能唤起她对生活的渴望时,她却被种族主义折磨得心神不宁,最后终于在白人社会的压力下背叛了摩西斯,却因此招致了杀身之祸。玛丽的一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南非高原上偏僻农场里贫穷的家庭主妇多半会精神崩溃,无独有偶,短篇小说《第二间棚屋》里的卡鲁瑟尔太太

在贫穷和孤独的双重折磨下,终日躺在床上,对周围的人和物,甚至是孩子都无动于衷。唯一能够让她起床和好起来的事就是离开南非高原这鬼地方,回到祖国——英国。

二、表面生活正常,内心扭曲异化的女人

如果说玛丽和卡鲁瑟尔太太是非洲大地上的悲剧人物,过着一种不正常的生活,那么格尔太太和巴恩斯太太则至少表面生活正常,因为她们没有精神崩溃,她们也没有触犯父权制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或者白色神话。虽然她们的丈夫和其他殖民者一样深深地被非洲大地所吸引,但是她们仍然坚强地忍受着,没有抱怨。格尔太太顽强地捍卫着自己的空间,巴恩斯太太则将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由于格尔先生把自家农场经营得很好,所以格尔太太不用为生活担忧,但是她却非常孤独。为了不至于在偏僻的南非高原上精神崩溃,她可谓用心良苦。对她来说,排遣孤独的重要手段就是和祖国保持紧密联系。和祖国保持联系,她要做的首件事情就是将农场的名字从“克鲁夫·耐克”改成“克鲁夫庄园”,一个属于英国人的名字。她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像其他女性殖民者一样通过拥有从祖国运来的家具,让自己有生活在祖国的感觉。此外,她随时提醒自己要保持内心宁静。她在起居室里巧妙地布置既有非洲风情的弯角羚角又有英国风味的古老家具,让“非洲和 18 世纪的英国在这间屋里混同在一起,和平相处”^{[8] (p104)} 用此景来暗示心情。再者,通过长期和国内的一位朋友通信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思乡之情。尽管这些信仅仅谈论一下国内的天气,英国的政治形式和一些她从没遇到过或永远不可能遇到的人,但阅读国内老朋友的来信是她生活中的最大乐趣。自从格尔太太“流放”到南罗德西亚,她和国内朋友通信已经有 30 年了。读国内朋友的来信不仅让她在心理上觉得一直和国内有联系,而且可唤起她早年在英国的生活经历,回忆支撑着她在南非生活下去。此外,和丈夫保持一种“正确”的关系也是支撑她在南非生活下去的主要因素。她努力在脑海里保留了一幅丈夫年轻时的英俊形象,以免自己会对他失望。尽管岁月不饶人,格尔先生身材已发福且肌肉松弛,但格尔太太看到的仍然是年轻时的丈夫:潇洒整洁、穿着考究,因为她不能承受该形象遭到破坏后的后果。^{[8] (p105)} 事实上,假象是她保持心理健康的必备条件之一。最为重要的是,她不得不让自己接受这

样一个事实——他们是朋友,完全可以忘记对方的存在。在认识到丈夫完全被大地——“野性的他者”所吸引,从而几乎意识不到她存在的事实后,她退缩了,退回到了自我的世界,并且学会热爱孤独。热爱孤独可以说是她对抗孤独和痛苦人生的最后一招。她为自己建了一座花园,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换来了天堂般的世界:“多美的花园啊!开着花的非洲灌木丛,生机勃勃的英式草坪,养着金鱼和栽着水仙花的水池花园。”^{[81] (p133)}在危险重生和神秘的非洲高原上,她为自己营建了一个安全和平的世界。孩子长大离开家,丈夫整日忙于农场事物,她所能做的便是干些杂活、花园里的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树荫下的长凳上闲坐几个小时“只要坐在这凳子上,经受风吹、日晒或瑟瑟的寒意,她就有勇气挑战任何事情。连绵的山是她的,它们就是她自己,它们造就了她,将她的孤独结晶,变成一道力量,它们支撑着她、养育着她。”^{[81] (p111)}对她来说,花园是天堂、避风的港湾。然而,花园同时又是囚禁人灵魂的牢房和监狱,它割断了格尔太太和外界的联系,加速了她心灵的扭曲和异化。

常年和外界隔绝,格尔太太失去了和人正常交往的能力。和德·韦茨太太的交往充分暴露了她可笑、僵化的思想和行为。对两家的交往,布多斯指出:“格尔夫妇代表着一种缺少联系和无法体验情感的生活,他们靠着表面的、少量的‘微风’控制他们的生活。德·韦茨夫妇的到来犹如一股强劲的飓风改变了格尔夫妇的生活。”^{[41] (p38)}改变最大的莫过于格尔太太,用布多斯的话来说,“剧烈的变故让本打算在南非高原上温和、平静地生活的格尔太太变成了一个愤怒、暴烈的女人,她的姓(Gales)预示着这种转变。”^{[41] (p38)}德·韦茨夫妇的到来让她意识到内心压抑的狂烈的情感,迫使她注意到自身深深的异化。在为德·韦茨夫妇的到来准备住处时,她很自然地把两张床安排在卧室的两边,因为在她看来,夫妻分开睡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她和格尔先生早已分房睡。她早已忘记了什么是正常的夫妻生活,并将可笑和不正常的夫妻生活当成自然和正常之事。难怪年轻的德·韦茨太太会认为格尔太太精神不正常。德·韦茨夫妇的亲热举动在她眼里恶心难忍,因此,她宁愿走路也不愿意搭乘他们的汽车。之后,她意识到自己行为可笑、举止荒诞,内心颇有些不安,被压抑的情感逐渐复苏。德·韦茨太太的年少不更事和朝气蓬勃扰乱了格尔太太刻意维持的平静生活,唤起了后者对

前者深深的同情,格尔太太不忍看到德·韦茨太太如花的青春埋葬在偏僻的农场。当德·韦茨太太在她面前哭诉孤独寂寞的生活时,格尔太太失去了多年刻意维持的平静和优雅,开始憎恶起男权制社会的种种习俗。她公开指责德·韦茨先生将年轻的妻子丢在家里是将其活埋,要将其逼疯。^{[81] (p121)}格尔太太的指责不仅仅是对年轻的德·韦茨太太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将自己对男权制社会的仇恨投射到了德·韦茨先生身上。德·韦茨太太出走的那晚,格尔太太压抑的情感如火山爆发迸裂而出,平生第一次开始憎恨她亲手打造的花园,憎恨这可恶的国家,“那夜,格尔太太恨透了她的花园——精心耕作的花园里枝繁叶茂,坐落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突然发生这种事的国家中部。这一切都是这个国家的错!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这个女孩可以搭乘火车回到她妈妈那里,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一切。可在这个鬼地方,绝望可能让这女孩自杀。”^{[81] (p126)}格尔太太的怨恨不仅揭示出庄园的落后和愚昧,而且揭示出这样的生活对孤独绝望的女性的毁灭

三、他者中的他者

相对于男人,女人是他者。由于生活方式不同,那些特立独行、有违常规的女人则被视为异端或他者,遭受其他女人的歧视和孤立,她们是他者中的他者。在莱辛的非洲作品中,《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特纳,短篇小说《露西·格兰奇》中的露西,短篇小说《老约翰的地盘》中的莱思太太是三个非常另类的可怜女人。玛丽对白人社会奉行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置若罔闻,拒绝邻居斯拉特太太伸出的援助之手和示好,引起后者及整个白人社会的反感和厌恶。和黑人摩西斯的暧昧关系以及最后被摩西斯所杀更让她成为白人社会的禁忌。和玛丽不同,露西和莱思太太渴望得到其他女人的友谊,却由于自身奢侈、卖弄、张扬的生活方式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清教徒思想格格不入,导致其他女人的嫉妒和孤立而郁郁寡欢。莱思太太无法得到其他女人的友谊,转而想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套近乎,无奈后者受到父母的影响,也不敢和她走得太近。

露西的生活方式和莱思太太相似。虽然原始、粗犷的南非高原将绝大多数女人改变成无奈的家庭主妇,露西却竭尽所能保持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家的房子与别家很不相同,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类型的书,墙上挂着很多画。这些书和画显示

出女主人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高雅的艺术品味,然而,在南非高原上追求高雅艺术难免有些不合时宜,难怪其他的家庭主妇没法理解。此外,露西很注意自身的保养和打扮。为保养好双手,她总是戴着涂满冷霜的手套,她的衣服很新潮,因为她总是从城里预定服装样式。而其他的家庭主妇总是穿着一成不变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是小店里的荷兰裔南非妇女马马虎虎缝完的,松松地扣在她们低垂的奶子上。这些女人平时头发蓬松,每六个月到城里去烫一次发;她们的女性特征就是嘴上那一抹随便涂上的口红。^{[8] (p535)}露西的与众不同很快让她成为其他妇女谈论的话题。露西对男人的魅力更让她们妒火中烧,她们对露西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了,最后她们干脆将她孤立起来——从不去拜访她,更不会打电话邀请她去玩。无奈之下,露西转向丈夫寻求支持,希望得到丈夫的赞赏,可忙碌的丈夫对露西的魅力丝毫没兴趣,露西缠着问的心理问题和眼泪更让他心烦。露西被彻底孤立了,孤独寂寞的她终于投进了一个上门推销保险的丑陋男子怀中,因为此男子理解她的孤独,了解并欣赏她所向往的高雅艺术。

四、结语

种族身份、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相互作用,迫使被“流放”在南非高原上的女人们只能呆在象征她们边缘身份的房屋内或靠近房屋的地方。虽然这是她们的家,但却不是她们渴望的家。流放者所遭受的无根性活活将她们变成了南非高原上苍白干瘪的夏娃:她们孤独、失意、沮丧、异化、崩溃。被

贫穷、孤独和无望折磨的玛丽·特纳最终走向了毁灭;与此命运相同的卡鲁瑟尔太太迫使丈夫同意永远离开南非;表面生活正常,内心却扭曲和异化的格尔太太和巴恩斯太太极力维持白种人的体面生活,早已忘却内心情感需要;被边缘化的他者——露西和莱思太太等人则只能独自品尝被主流白人社会排挤的孤独和郁闷。

【参考文献】

- [1] Said, Edward W.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86
- [2] Thope, Michael. Doris Lessing's Africa [M]. Evans Brothers Limited, 1978. 44.
- [3] Kort, Wesley A. Place and Space in Modern Fiction [M].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4. 17.
- [4] Budhos, Shirley. The Theme of Enclosure in Selected Works of Doris Lessing. New York: The Whitst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30, 38, 38.
- [5] Lessing, Doris. Martha Quest [M] (1952).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70. 14.
- [6] 多丽丝·莱辛. 野草在歌唱 [M]. 王蕾,译.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 33, 52-53, 74, 85.
- [7] Zak, Michele Wender. "The Grass Is Singing: A Little Novel About the Emotions" [A], Doris Lessing: Critical Studies [C], ed. Annis Pratt and L. S. Dembo,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67.
- [8] Lessing, Doris. African Stories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81. 104, 105, 133, 111, 121, 126, 535.

(责任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Exiled Eves in the " Petrified Garden "

——Female Protagonists on Doris Lessing's South African Veld

JIANg Hua

(Intensive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Doris Lessing's African works roughly depict three categories of white female settlers on the farm on South African Veld. Mary Turner and Mrs. Carruthers represent poverty-stricken, lonely and depressed housewives on remote farms, Mrs. Gale and Mrs. Barnes those leading "normal" daily life but abnormal spiritual life, Mrs. Grange, Mrs. Lacey and Mary Turner the others among white housewives on the Veld.

Keywords: South African Veld; poverty-stricken women; alienated women; the Others among the Other